

# “女人怎会懂得银行业务”：《海斯特》与 19 世纪英国的银行恐慌

## “How Can a Girl Understand Banking Business”: Hester and the Banking Panic in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王卫新 (Wang Weixin)

**内容提要:** 本文借用新经济批评视角,对苏格兰作家玛格丽特·奥利凡特的《海斯特》进行解读。在《海斯特》中,奥利凡特让约翰和爱德华两位男性在银行业败北,而凯瑟琳则在家族银行面临挤兑风波之时大显身手。约翰临危逃逸,爱德华利用朝发夕至的邮政业务进行金融投机,而凯瑟琳则是练就了面对金融风险处事不惊的性格。在《海斯特》中,女性“既不庸俗也不卑微”,凯瑟琳通过拯救家族银行,保住了维农家族的尊严。同时,因为维农银行在当地人心目中是“稳定性和实力仅次于英格兰银行”的行业领军者,保住维农银行也就相当于稳固了英国乡村的金融体系。英格兰银行的及时出手,和女性银行家的个人才能一道,对 19 世纪英国不断发生的银行恐慌进行了有效的抵制。

**关键词:** 《海斯特》; 苏格兰; 女人; 银行恐慌; 挤兑; 投机

**作者简介:** 王卫新,文学博士,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苏格兰文学和文学与经济跨学科研究。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苏格兰小说史”【项目编号:15FWW001】的阶段性成果并受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内涵建设项目资助。

**Title:** “How Can a Girl Understand Banking Business”: *Hester* and the Banking Panic in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Abstract:** This essay reads Margaret Oliphant's *Hester* in light of new economic criticism. Oliphant challenges the notion of banking as a man's business and endows women with talent for business. It is Catherine who settles the two threatened runs on the bank, the first of which is caused by John Vernon's personal extravagance and the second, by Edward's stock market speculation. John Vernon escapes from his due responsibility right before the first run on the bank and Edward takes advantage of the same-day postal service to be in instant contact

with the speculators in London. In *Hester*, women bankers are “neither vulgar nor mean.” By saving the banking house of the Vernons, Catherine keeps the honor of personal business as well as the whole financial system, for the Vernons is known as “only second to the Bank of England in stability and strength.” The aid of the Bank of England and the woman banker’s talent for business, serve as a protective screen from the recurrent banking panics in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Key words:** *Hester*; Scotland; woman; banking panic; a run on the bank; speculation

**Author:** Wang Weixin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1620, China). His major academic interests are Scottish literature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conomy (Email: wilson69@163.com).

在为维拉格版《海斯特》(*Hester*, 1883)所撰写的导论中,詹妮弗·厄格洛将苏格兰女作家玛格丽特·奥利凡特(Margaret Oliphant, 1828-1897)的名作定性为将“维多利亚社会两个核心的机构——资本主义和家庭”(Uglow xvii)融为一体的小说。诚如厄格洛所言,在《海斯特》中,资本主义和家庭是无法截然分开的:维农家族的兴衰取决于维农银行的兴衰,维农家族成员的地位也主要取决于他(她)在维农银行经营中的地位。但是,在小说叙述中,资本主义和家庭并没有平分秋色,小说中家庭叙述的篇幅远远大于资本主义叙述的篇幅。或许正是由于家庭叙述一直在小说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倾向于将《海斯特》放在家庭小说(domestic novel)或者社会风俗小说(novel of manners)的框架下进行讨论,对小说中的资本主义话题予以忽略。菲利普·戴维斯和布莱恩·纳里斯特在为牛津版《海斯特》所撰写的导论中盛赞小说女主人公凯瑟琳的功绩,说她是莱德堡镇的女族长,说她身上有“一种伊丽莎白女王和维多利亚女王气质的接地气的融合”(Davis & Nellist viii)。同样,莫妮卡·科恩在“凸显奥利凡特”一文中认为,奥利凡特小说中的女性问题可以归类为“托利党女性传统”(Cohen 101),她的功绩仅仅在于她意识到了公共生活中的性别不平等。

为奥利凡特贴上托利党女性标签并没有错,她曾多次为站在托利党立场的《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撰文发表自己对女性问题的见解,女性独立也确实是她非虚构以及虚构作品的重要主题,但必须指出的是,奥利凡特所谈的女性独立较少涉及政治权益,她谈论更多的是经济独立。《海斯特》的女主人公凯瑟琳之所以能够成为莱德堡镇的女族长,是因为她在维农银行面临挤兑(a run on the bank)危机之时处事不惊,拿出自己全部积蓄并邀请英格兰银行的主管出手相救,使维农家族转危为安。在银行这个本该属于男性的世界,维农银行的男性掌舵人约翰逃之夭夭,拯救家族的重

任阴差阳错地落在凯瑟琳的身上。诚如南希·亨利所言，“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女人无法在政治选举中投票，但她们可以买股份、做股东、公司、投票选举公司主管”（Henry 111）。在女性尚未获得政治选举权的时代，虽然银行业被认为是男性更为适宜，但女性在经济市场并没有被彻底剥夺权利，这是凯瑟琳得以施展才能的社会基础。由于经济市场是《海斯特》中女性施展才能的最重要的渠道，所以，借用新经济批评视角，对《海斯特》进行重新解读就显得尤为必要。凯瑟琳拯救了维农银行，也拯救了整个维农家族。而且，由于维农银行在当地人心目中是“稳定性和实力仅次于英格兰银行”的行业领军者，保住维农银行也就相当于稳固了英国乡村的金融体系，对 19 世纪反复发生的银行恐慌进行了有效的抵制。

### 一、有惊无险的银行恐慌

虽然《海斯特》中关于维农银行两次危机的叙述篇幅不长，但它却阴差阳错地布局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让小说的读者自始至终都无法摆脱银行恐慌的阴影。此外，虽然小说名为《海斯特》，但海斯特其实只是个有名无实的角色（titular hero），这似乎也在暗示读者海斯特与爱德华和哈利之间的感情纠葛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家庭琐事并非小说的重心。《海斯特》真正的主角是凯瑟琳，她虽然在爱情和婚姻中受挫，但她并未因为婚姻失败而气馁，在维农银行面临危机的紧要关头，凯瑟琳以一种处事不惊的方式，从容应对了小说开头（19 世纪 20 年代末）和结尾（19 世纪 60 年代）的两次银行恐慌（banking panic）。

《海斯特》开头的那一次银行恐慌发生在 19 世纪 20 年代末期，事件的起因是维农银行的掌舵人约翰·维农挥霍无度，他不听自己母亲苦口婆心的教诲，也拒绝律师所提出的让凯瑟琳参与维农银行管理的动议。在约翰·维农的眼里，银行业务是男人的专利，女人参与银行业务只是添乱而已，“女人怎会懂得银行业务？”（Oliphant 8）这句对女性不屑一顾的话即出自约翰之口。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是在约翰·维农这个男性沙文主义者掌舵维农银行的时候，莱德堡镇上的农民们开始风言风语，维农银行即将倒闭的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最终导致了大集之日的挤兑风波（a run on the bank）。

作为维农银行的掌舵人，在维农银行面临挤兑风波的关键时刻，约翰选择了逃逸。小说中没有给出确切的约翰的行踪，但从约翰夫人的陈词以及约翰夫人和她的女儿海斯特返回莱德堡之前的住地推断，约翰最大的可能性是去了法国。由于“当时还没有电报”（Oliphant 15），无论是约翰夫人，还是银行职员，都无法和约翰取得联系。约翰·维农逃逸之后，银行高管鲁尔忠于职守，连夜将消息上报给约翰夫人。约翰夫人对银行业务一窍不通，她丈夫的那句名言“女人怎会懂得银行业务”用在她身上倒是十分贴切。她连什么是挤兑都不知道，如何应对挤兑风波更是无从谈起。当鲁尔说银行此时

需要准备大量现金之时，她竟然哆哆嗦嗦地拿出 20 英镑的私房钱，问鲁尔这 20 英镑能否派上用场。鲁尔失望至极，但他临危不乱，他连夜找到凯瑟琳求救。凯瑟琳不仅拿出全部积蓄，还成功地邀请了英格兰银行的主管出手相救。到了大集之日，当农民们看到维农银行现金充足、所有银行业务都井然有序之时，便纷纷打消了取回存款的念头。凯瑟琳挽救了维农家族的命运，并因此成为莱德堡镇的女族长，“处处都以她冠名，凯瑟琳街，凯瑟琳广场，还有没有编号的凯瑟琳街区”（Oliphant 23）。

19 世纪 20 年代末的这场维农银行的挤兑风波之所以有惊无险，凯瑟琳固然是功不可没。但是，仅有凯瑟琳的处事不惊是远远不够的，英格兰银行及时伸出援手、19 世纪 20 年代农民存款数额不大也是维农银行成功逃过一劫的重要因素。根据《从狄更斯到〈德古拉〉》（*From Dickens to Dracula: Gothic, Economics, and Victorian Fiction*, 2005）一书所提供的数据，1840 年英国人均存款只有 13 先令，19 世纪 20 年代末比此数据更低（Houston 15）。而且，按照玛丽·普维《19 世纪英国金融体系》（*The Financial System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2003）一书中的记述，农闲时节乡村银行的资金会向伦敦的银行流动，而农忙时节资金会从伦敦的银行回流（Poovey 2）。《海斯特》没有提供挤兑风波是农忙还是农闲时节的线索，所以，我们无从推断当时资金到底向哪一方流动。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 19 世纪 20 年代末期维农银行农民存款的数量不是很大，凯瑟琳拿出的数千英镑的积蓄，在挤兑风波即将爆发之时应该能够及时派上用场。

此外，1825 年至 1826 年间英国爆发了 19 世纪首次大规模金融危机，其间 93 家英格兰、威尔士银行倒闭，著名的苏格兰小说家司各特爵士也因此次危机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沉重的债务最终拖垮了他的身体，所以，尼古拉斯·施瑞姆普顿十分形象地说：“1820 年代中期的这场商业危机最明显的文学效应就是司各特爵士的毁灭”（Shrimpton 22）。危机爆发之时，英国著名诗人托马斯·皮考克（Thomas Peacock, 1785-1866）曾挥笔写下《纸币抒情诗》，诗中真实地再现了银行倒闭浪潮中人们对纸币的疑惑：

乡村银行纷纷崩溃，  
伦敦银行摇摇欲坠。  
疑神疑鬼人心难测，  
连教友派信徒都哆哆嗦嗦。  
经验似乎一锤定音，  
纸币永远也成不了黄金。  
各种各样支付的承诺，  
顶不了吃的，顶不了穿的。（Peacock 101）<sup>1</sup>

1 凡未特殊注明，引文均出自笔者拙译。

危机爆发之后，英国政府痛定思痛，开始鼓励英格兰银行在边远乡镇开办分行，重点支持信誉优良的乡村银行，以备不时之需（Oliphant 458）。非常幸运的是，《海斯特》中的维农银行恰恰就是 19 世纪首次大规模金融危机之后英格兰银行愿意重点支持的信誉优良的乡村银行：

这附近所有的郡县都知道维农银行的实力和稳定性仅次于英格兰银行。也就是说，凡是知道这件事的人，生意人、职业者、以及那些自认为熟悉这个世界的人，都会认为它是银行业的老二。但大部分顾客，莱德堡以及附近城镇的小店主，还有周边许多地方的农民，以及那些许多小钱凑到一起才能变大钱的小人物们却并不认为它是老二。对他们而言，维农银行是稳定的徽标，是不受人力影响的稳定的实在的财富的象征。（Oliphant 1）

《海斯特》结尾的那一次银行恐慌发生在 19 世纪 60 年代，“铁路、电报和朝发夕至的邮政服务意味着爱德华可以几乎同时地和隐蔽的、匿名的经纪人相联系。”（Davis & Nellist xvi）作为凯瑟琳最器重的银行高管之一，爱德华·维农利用电报和朝发夕至的邮政服务的优势，使得遥远的莱德堡可以和伦敦信息同步，但信息的同步并没有给他带来收益，反倒使他因为屡屡亏损而使维农银行再次陷入危机。爱德华从事股票投机对维农银行的危害比约翰挥霍无度可能更大，但是，由于他的股票投机是秘密进行，所以，虽然他的股票投机行为引发了银行内部的恐慌，但恐慌尚未导致银行挤兑。已然到了退休年龄的凯瑟琳再度出山，再一次扮演了维农家族救星的角色。

## 二、无法遗传的商业才能

非常有趣的是，爱德华从事股票投机的动因不是因为他缺钱或者寻求刺激，而是他把股市投机作为男人风范的标志。爱德华的伙伴罗兰德一语道破了其中的奥秘：“男人可以在爱情、战争、冒险、寻欢中失去头脑，但在股市交易中却绝不可以”（Oliphant 309）。翻开英国股票投机的历史，虽然找不到股票投机是男人专利的直接证据，但关于股市优劣的经典论述来自男性，而且女性投资者在许多时候会依赖男性投资者的建议似乎是个不争的事实。18 世纪英国著名作家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 1672-1719）在《观察家》上撰文盛赞股市为“一次盛会，所有的重要的国家都有自己的代表”，而托马斯·戈登（Thomas Gordon, 1691-1750）则认为股市就是吸血鬼，股市从业者“不仅骗了我们的钱，还骗了我们的性”（Henry 116）。1710 年，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曾经力荐斯黛拉购买英格兰银行股份，使其受益；1720 年，亚历山大·蒲伯（Alexander Pope, 1688-1744）曾建议玛丽·

蒙塔古购买南海股票，使其蒙受巨大损失。英国的股市投机延续着一种男性传统，19世纪中叶又恰逢英国铁路股票投资的高潮，作为女性的凯瑟琳可以在金融界大显身手，作为男性的爱德华为什么不可以呢？抱着这样一种挑战的心态，爱德华卷入股市投机，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海斯特》中，奥利凡特让约翰和爱德华两位男性在银行业败北，而凯瑟琳则在家族银行面临挤兑风波之时大显身手，用当代的视角审视，我们可以将其简单地归结为凯瑟琳比约翰和爱德华两位男性更具商业才能。但是，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语境中，问题似乎并非如此简单。翻开维多利亚时期的历史，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就在小说结尾的那一次银行恐慌发生的年代（19世纪60年代），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后不久，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 1822-1911）就开始在《弗雷泽杂志》和《麦克米伦杂志》上撰文宣扬才能遗传问题。高尔顿认为，就大多数案例而言，男性之间才能的传输和女性之间才能的传输的比率是70:30，或者2:1多一点儿（qtd in Hunt 160）。简而言之，男性继承商业才能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女性继承商业才能的几率。所以，在19世纪20年代末，当凯瑟琳成功地应对了维农银行的挤兑风波之时，莱德堡镇有人说她是“她曾祖父商业天才的继承者”（Oliphant 22），而到了19世纪60年代，当人们重新议论起这件事的时候，人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说：“真正拯救了银行的，与其说是凯瑟琳个人的力量和才能，不如说是凯瑟琳的钱”（Oliphant 73）。

弗朗西斯·高尔顿的才能遗传论值得商榷，但维多利亚时代民众普遍认为女性在商业才能遗传方面处于劣势似乎是一种共识，这也是《海斯特》这部小说不断凸显银行是男人的世界这一观点的原因所在。作为一位成功的女性银行家，凯瑟琳选择未来掌舵人的时候还是选择了爱德华和哈利两位男性，她从一开始就认识到海斯特在性格方面和自己很像，她相信如果条件允许，海斯特或许也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商业人才，但她坚定地认为条件不允许。奥利凡特的传记作者威廉姆斯对凯瑟琳对待海斯特的态度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她认为，凯瑟琳在培养女继承人方面是十分审慎的，她不相信海斯特能像她一样能够成为出色的银行家：“在正常情况下，女孩不可能胜任这种职业，因为社会不允许”（Williams 158）。小说的结尾用事实证明凯瑟琳的论断，在维农银行因为爱德华股市投机而再次面临危机之时，已然长大成人、而且几乎可以视为凯瑟琳翻版的海斯特却无所作为，还得已然年迈的凯瑟琳亲自出马，来应对这一触即发的维农银行危机。

既然男性的商业才能更容易遗传，那么，为什么维农银行的先辈成功地躲过金融危机，而凯瑟琳的前任银行掌舵人约翰·维农面对小说开头的那一次银行恐慌时却束手无策，仓惶逃逸呢？艾伦·亨特在《个人业务：维多利亚文学与文化中的人物与商业》（*Personal Business: Character and Commerce in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014）一书中给出了令人满意的答案。亨特

认为，在《海斯特》的开头，当危机逼近维农银行的时候，维农银行当时的掌舵人老约翰·维农逃过了危机，但他所提供的经验却是难以言说而且无法遵循的，“它未能提供实实在在的知识与实践模式，公司现任掌舵人无法遵循，家庭成员之间通过生物传输继承这种才能的可能性非常小”（Hunt 154）。

维农家族的两位男性都在银行业败北，这并不意味着弗朗西斯·高尔顿的才能遗传论是荒谬的。即便商业才能可以在男性之间代代相传，说不清道不明的商业才能在银行恐慌来临之际也是无济于事的。《海斯特》的开头讲了一大堆冠冕堂皇的套话，说维农银行的前辈拥有“点石成金”的法力，说这种法力是一种特殊天赋，如同一位天赋异禀之人创作了一幅好画或写出了一首好诗，但却说不出其中的道理：

〔……〕他的每笔投资都有收益，他的商船总能平安归来，在他主事期间，在人们的想象中，维农银行的地窖里到处是黄金。在他主事期间，曾经有一次银行恐慌席卷全区，由此引发了挤兑风波，别的人肯定是，或者，哦，应该是被拖垮了，唯独维农没有被拖垮。约翰本人都不知是如何死里逃生的，更何况是别人。（Hester 1）

如果说弗朗西斯·高尔顿的才能遗传论的聚焦是可遗传性（heritability），那么，《海斯特》中商业才能的聚焦则应该是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在商业才能说不清道不明的情况下，即便商业才能真的如高尔顿所说可以在男性之间薪火相传，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才能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维农家族的两位男性都在银行业败北即为明证。按照弗朗西斯·高尔顿的理论，凯瑟琳的商业才能是莫名其妙的，它不太可能是祖辈的遗传，也不太可能继续传承下去。在《海斯特》中，凯瑟琳的前任都是清一色的男性银行家，她本人终身未嫁，她精心挑选的两个男性维农家族未来的掌舵人中，爱德华背着她从事股市投机，哈利忠心耿耿但十分平庸。好不容易有个和她性格最相近的海斯特，也未能继承她的商业才能，未能成功应对小说结尾维农银行面临的又一次危机。凯瑟琳在小说中被叙述者称为枯树（dry tree），从家庭生活方面讲，她虽然终身未嫁，但生活在一大群需要由她供养的维农家族成员中，她并不感到孤寂。但是，就商业才能而言，她仿佛是横空出世的人，在维农家族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且，像老约翰·维农一样，她成功地应对了银行恐慌，却无法让成功的经验形成可供后人参照的文字。因此，即便女性之间商业才能也可以相传，凯瑟琳的商业才能也无法复制。就这一点而言，凯瑟琳似乎真的就是一棵枯树。

### 三、金融体系中的职业女性

通过对两次银行恐慌以及男性和女性银行家在银行恐慌中的不同表现的

书写,《海斯特》真实地再现了 19 世纪英国动荡不安的金融市场图景,并试图展现职业女性在维多利亚时代难以言说的金融体系中的迷人风采。根据《从狄更斯到〈德古拉〉》一书所提供的数据,银行恐慌乃至金融危机在 19 世纪英国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在 1825-26 年和 1878 年两次金融剧震之间,1837 年、1847 年、1857 年、1867 年爆发过四次金融危机,1842 年、1864 年、1873 年还有三次小规模的金动动荡(Houston 14)。基本上是每隔十年必有一次大难,银行恐慌乃至金融危机成了 19 世纪英国民众挥之不去的阴影。像 1825-26 年和 1878 年那样的金融剧震是猝不及防的,危机的爆发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但许多像《海斯特》开头所出现的那种小规模银行恐慌有时是莫名其妙的,一两句谣言就足以让一家小的银行因现金储备不足而陷入绝境。“恐慌是大脑中一系列信念的崩溃”(Houston 9),而信念的崩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金融体系的一知半解。

实际上,在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大多数英国公民只能对金融体系的某些部分有所把握,而且他们了解这一部分的金融体系也只能通过文字,但是,“他们所接触到的文字并不总是愿意(或能够)提供全面而准确的信息”(Poovey 4)。比如,1851 年英吉利海峡海底电缆成功铺设,1866 年伦敦至纽约铺设海底电缆,这些举措使得英国金融市场扩大,政府的本意是给英国民众拓宽投资机会。但是,当时有些激进人士却坚持认为,包括英国国债在内的证券都是上层社会给下层社会所精心布置的骗局,英国政府所开拓的金融市场都是用来吸干劳苦大众(the labouring poor)的血汗钱的。此外,由于英国民众了解金融体系的最重要渠道是通过文字,所以,某些媒体的报道有时也会引发民众的恐慌情绪。玛丽·普维在《19 世纪英国金融体系》一书中收录了许多案例,她认为,此类恐慌主要是由于主流媒体大量刊载某家银行放账过多(overextended)的消息所致:“连《泰晤士报》这样遵规守据的报纸,由于刊载了愤怒的人群聚集在伦巴第街的报道,也会引发忧心忡忡的投资者向银行索要他们的钱,因此增加了借贷者的烦恼”(Poovey 5)。

为了消除公众的恐慌情绪和普及经济学知识,包括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学人》杂志主编瓦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 1826-1877)在内的英国有识之士纷纷著书撰文,就金钱市场、纸币及信用等问题发表各自的见解。白芝浩在《恐慌》一文中强调,1866 年的恐慌是信用恐慌,而信用恐慌考验的是整个金融体系,英国的信用体系之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没有哪家银行能在其他银行倒掉的情况下独自存活”(Bagehot 324)。与男性经济学家相对高深而枯燥的经济学论述不同,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女作家哈丽雅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 1802-1876)试图用虚构的文学故事来普及经济学知识,她于 1832 年至 1834 年隆重推出了旨在普及经济学知识的九卷本小说系列《政治经济学图解》(*Illustra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在《政治经济学图解》小说系列之中,《银行家伯克利》(*Berkeley the Banker*,



1843) 直接触及了黄金原则和纸币的问题。马蒂诺在小说的结尾写道：“由于纸币发行有利可图，一旦可兑换性的限制被解除，当银行信用没有足够的安全保障，纸币发行自然会变得过剩”（Martineau II 190）。马蒂诺并不认为以黄金为基础的货币（bullion）就一定安全，但纸币和信用失控导致银行恐慌的几率应该更高。艾琳·弗雷德古德将其论述马蒂诺和政治经济学的文章命名为“驱除恐慌”，她通过大量的例证说明，马蒂诺写《政治经济学图解》是因为她坚信来自维多利亚时代统计学家的一句名言“知识可以驱除恐慌”（Freedgood 210），而恐慌和风险是现代性的必然产物。

和马蒂诺的《政治经济学图解》不同，奥利凡特写作《海斯特》的目的不是要用普及经济学知识来驱除恐慌，她书写银行恐慌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凸显女性在难以言说的金融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在一个普遍认为银行是男人的世界、商业才能在男性之间传输几率远远高于女性的时代，凯瑟琳在维农银行出现危机之时挺身而出，力挽狂澜，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如前文所述，在19世纪的英国，政治选举的大门尚未向女性敞开，而投资的大门是敞开的，所以，包括乔治·爱略特（George Eliot, 1819-1880）等著名女作家在内的女性都尝试着在投资市场小试牛刀。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女性投资者（women investors）和女性职业者（women professionals）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根据历史学家乔治·罗布提供的资料，在19世纪的美国确有少数女性银行家和女性经纪人存在，但在英国的金融体系和教育体制中这是难以想象的。英国男性的教育和社交圈有利于他们成为银行家，《银行杂志》《铁路时报》《经济学人》《金融时报》是男性在酒吧、咖啡馆、餐厅就能读得到的东西，而女性通常是读不到这些杂志的（Robb 121）。

阿尔伯特斯在《玛格丽特·奥利凡特与小说政治史》一文中指出，奥利凡特“努力保持这样一种中产阶级立场，仿佛复杂的家庭管理才能是男性合作者赐予她的，而不是她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的”（D’Albertis 811）。这句话用在《海斯特》的女主角凯瑟琳身上也极为贴切。和奥利凡特一样，凯瑟琳并不是一个生来就立志要做女性银行家的女强人，她成为女性银行家是因为维农银行的前任掌舵人约翰在挤兑风波爆发之前人间蒸发，为了拯救维农家族，她不得不挺身而出。凯瑟琳是整部小说中唯一一位成为银行家的女性，和她性格极为相近的海斯特最终也没有这份殊荣，至于她的才能到底是否男性所赐，小说自始至终也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是，如果我们采信弗朗西斯·高尔顿的才能遗传论的说法，如果商业才能在女性之间很难传输，那么，她的商业才能只能来自男性先祖，这总比说她的才能从天而降更符合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观念。

正是由于女性在银行业以及才能遗传论中处于不利地位，凯瑟琳的胜出才显得更加弥足珍贵。而且，正是由于维农银行是私家银行，维农银行和维农家族的命运是绑定的，凯瑟琳的挺身而出才更加具有可信性。在《海斯特》

中，作为私人领域的家庭和作为公共领域的职业生涯是很难截然分开的。作为维农家族的一员，拯救家族命运是凯瑟琳义不容辞的责任，男尊女卑在这种场合恐怕是派不上用场的。莫妮卡·科恩认为，奥利凡特小说中女性书写最突出的特点是“她的家庭书写模式与传统的将家庭和职业分开，男人生产、女人消费的表征方式大相径庭”（Cohen 99）。在《海斯特》中，男人生产、女人消费的模式被彻底解构，约翰成了过度消费的代表，而凯瑟琳则成了创造财富的楷模，凯瑟琳的职场生涯和她的家庭生活也是密不可分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凯瑟琳处于一个女性独立和独身已经逐渐被社会所接受或者忍受的时代，在维多利亚时代很有影响的杂志《威斯敏斯特评论》刊载了许多诸如《独身女性的未来》之类的宣扬女性独立和独身的文章，“凯瑟琳既经济独立又选择独身”（王卫新 128），这一点是符合当时女性主义潮流的，这或许就是奥利凡特将小说的副标题定名为“当代生活的故事”的原因所在。

正是由于《海斯特》中家庭和职业密不可分，所以，我们在解读小说中的家庭书写的时候，绝不能将其局限于家庭生活范畴之内。新加坡学者塔玛拉·瓦格纳认为，《海斯特》中的女性书写“是为了逆转人们所熟悉的情节，目的是从新的角度探索女人在商业中的作用”（Wagner 160）。凯瑟琳拯救了维农银行，也拯救了整个维农家族，但在 19 世纪特殊的语境中，她所拯救的又不仅仅是维农家族这样一个大家庭。由于维农银行在当地人心目中是“稳定性和实力仅次于英格兰银行的”的行业领军者，保住维农银行也就相当于稳固了英国乡村的金融体系，对 19 世纪反复发生的银行恐慌进行了有效的抵制。美国学者艾尔西·米奇借用格兰特·艾伦（Grant Allen, 1848-1899）的话来说明 18 世纪和 19 世纪英国的巨大差异，她说 18 世纪人们认为有美德才会有幸福，而 19 世纪人们认为“有幸福才会有美德”（Michie 77）。由此足见金钱在 19 世纪英国公众心目中的重要性。19 世纪是金融危机频发的时代，在金融体系难以言说、经济学地位尚未稳固、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周期理论（cycle theory）尚未普及的时代，恐慌是难免的。恐慌有时只是信念的崩溃，有时则可能是信用危机的必然产物。恐慌袭来之时是不分男女的，同样，在应对恐慌的时候，也不应该讲什么男尊女卑。《海斯特》中凯瑟琳的胜出，以及约翰和爱德华的败北，足以说明女性是可以在通常被认为是男人世界的银行业大展身手的。正是由于在弗朗西斯·高尔顿的才能遗传论以及在维多利亚人关于银行业和金融体系的意识中女性处于不利地位，《海斯特》中凯瑟琳成为成功的女性银行家才显得愈发弥足珍贵。凯瑟琳的成功范例，既是对才能遗传论的有力回击，又是对女性独立又独身的女性主义思潮的有力支持。

### Works Cited

Bagehot, Walter. "The Panic." *The Financial System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Ed. Mary Poovey.

Oxford: Oxford UP, 2003: 321-327.

Cohen, Monica. “Maximizing Oliphant: Begging the Ques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atire.” *Victorian Women Writers and the Woman Question*. Ed. Nicola Diane Thomp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9. 99-115.

D’Albertis, Deirdre. “The Domestic Drone: Margaret Oliphant and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Novel.”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4 (1997): 805-829.

Davis, Philip & Brian Nellist. “Introduction.” *Hester*. Eds. Philip Davis & Brian Nellist. Oxford: Oxford UP, 2003. vii- xxvi.

Freedgood, Elaine. “Banishing Panic: Harriet Martineau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New Economic Criticism*. Eds. Martha Woodmansee & Mark Ostee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Henry, Nancy. “Ladies Do It: Victorian Women Investors in Fact and Fiction.”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Finance*. Ed. Francis O’Gorman. Oxford: Oxford UP, 2007. 111-132.

Houston, Gail Turley. *From Dickens to Dracula: Gothic, Economics, and Victorian Fi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5.

Hunt, Aeron. *Personal Business: Character and Commerce in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 U of Virginia P, 2014.

Martineau, Harriet. *Berkeley the Banker*. Vol. I-II. Hartford: A. Andrus and Son, 1843.

Michie, Elsie B. “Buying Brains: Trollope, Oliphant, and Vulgar Victorian Commerce.” *Victorian Studies*, 3 (2001): 77-97.

Oliphant, Margaret. *Hester*. Eds. Philip Davis & Brian Nellist. Oxford: Oxford UP, 2003.

Peacock, Thomas Love. *The Works of Thomas Love Peacock*. Eds. H. F. B. Brett and C. E. Jones. Vol. vii. London: Constable, 1924-34.

Poovey, Mary. “Introduction.” *The Financial System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Ed. Mary Poovey. Oxford: Oxford UP, 2003.

Robb, George. “Ladies of the Ticker: Women, Investment and Fraud in England and America, 1850-1930.” *Victorian Investment: New Perspectives on Finance and Culture*. Eds. Nancy Henry & Cannon Schmitt.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P, 2009. 120-142.

Shrimpton, Nicholas. “‘Even These Metallic Problems Have Their Melodramatic Side’: Money in Victorian Literature.”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Finance*. Ed. Francis O’Gorman. Oxford: Oxford UP, 2007. 17-38.

Uglow, Jennifer. “Introduction.” Oliphant, Margaret. *Hester*. London: Virago, 1984. ix-xxi.

Wagner, Tamara S. *Financial Speculation in Victorian Fiction*.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P, 2010.

王卫新等：《苏格兰小说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

[Wang Weixin et al. *A History of the Scottish Novel*.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

Williams, Merryn. *Margaret Oliphant: A Critical Biography*. Houndmills: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6.